深化增长极理论研究，避免四大实践误区

探索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路径

□ 韩建文

第1落点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要求“深度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这一重要指示，既是总书记对山东“走在前、挑大梁”的殷切期望，也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实践研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深化理论研究、找准建设方向，亟须从增长极底层逻辑、形成机制、实践路径等方面深入探索、作出回答。

纵深解构理论根基，以增长极三阶段能力重塑发展逻辑

增长极理论自1950年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后，经布代维尔、弗里德曼等丰富完善，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但传统西方经济学以极化效应、扩散效应为逻辑框架构建的增长极理论，存在缺乏阶段性考量、动态适应性弱、系统性把握不足等局限。要深化理论研究，需立足实践需求，着眼增长极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重新审视并强化其核心能力。

培育发展阶段：强化吸引集聚能力，突破传统要素集聚认知局限。传统增长极理论将要素集聚视为趋利性单向流动，忽视要素协同共生关系，易陷入发展瓶颈。深化理论研究需要运用系统论思维，重新定义要素集聚—既要物理空间集中，更要追求协同效应。上海依托港口与金融优势，通过制度创新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推动资金流与物流协同；深圳凭借特区政策聚焦新兴产业，打造产学研平台，促使技术、资本、人才在新兴领域相互赋能。二者打破传统集聚逻辑，构建协同生态，实现了从区域性中心城市向辐射全球区域增长极的跨越跃升。

成长巩固阶段：强化调控引领能力，补足区域协调机制的结构性短板。传统增长极理论依赖自然扩散效应，缺乏主动协调的制度设计，易导致中心—外围失衡。深化理论研究需要强化系统协同思维，赋予增长极“调控中心”功能，通过动态信息传导机制主动协调分工协作、优化资源配置。香港、深圳、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依托金融、科技、贸易优势，借助跨区域协同平台推动资源配置。深圳科创企业与东莞制造企业通过产业链协同，实现研发与生产衔接，形成市场主导—信息联动—调控引领的区域发展范式。

辐射拓展阶段：强化迭代升级能力，打破增长极静态化认知。传统增长极理论以静态视角将增长极视为固定经济单元，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变革节奏。在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浪潮下，市场格局重塑、产业竞争加剧，增长极若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策略，将在竞争中失势。如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凭借资源与工业基础成为重要增长极，但改革开放后受传统思维与体制束缚，长期依赖重工业，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突出。20世纪末东北三省重工业产值占比超80%、新兴产业不足10%，失衡结构导致其创新乏力、市场化缓慢、要素外流，迭代升级能力滞后，逐步失去增长极地位。

增长极建设三阶段对应的三种能力，既独立发挥效能，又通过相互依存、协同促进的内在机制，共同推动增长极的动态演进。吸引集聚能力构筑增长极的“能量基座”，调控引领能力锻造增长极的“战略筋骨”，迭代升级能力注入增长极的“变革基因”，三者共同构成增长极理论的核心动力体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思路。

聚焦集聚调控核心，解析增长极六大控制驱动的形成机制

深度解析增长极三阶段需强化的三种能力，可凝练为集聚调控能力。基于系统论整体性与控制论反馈机制，这一核心能力又可具象为六大核心载体，从而构建起从微观产业到宏观区域、从单一业态升级到生态环境协同的支撑体系。

终端环节的集聚控制：产业链的需求锚点。产成品终端环节是整条产业链的集成点，也是产业链连接市场的结合点，其通过市场反馈反向牵引资源配置。苹果、华为凭借消费需求洞察、产品标准把控和品牌塑造，将芯片研发、精密制造等上游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形成需求端—供给端信息闭环，掌握技术迭代、行业标准和价值分配主导权。区域终端企业数量与质量决定集聚调控能力强弱，北方地区因终端产成品占比偏低，导致集聚调控能力不足，这是南北经济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推进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的关键突破口。

稀缺环节的技术控制：产业链的核心支点。在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中，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构成卡脖子环节，形成强大的技术虹吸效应。如半导体产业，光刻机精密制造、高端芯片设计以及新能源领域的固态电池材料研发等，均属于这类稀缺资源。掌握这些关键环节的企业，凭借深厚的技术壁垒与完善的专利网络，对上下游企业形成强控制力。如果一个区域能够在多个稀缺环节构筑技术优势，便可形成技术控制节点矩阵，其引领能力就愈强。稀缺环节技术控制能力的显著差异，是南北经济差距逐步扩大的深层原因，更是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的攻坚重点。

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控制：集聚发展的地理中枢。在产业演化进程中，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控制并非简单的企业地理扎堆，而是通过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与制度协同，构建要素流动的物理枢纽与协同网络。这种控制以空间邻近性为基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服务企业及创新机构在特定区域形成“集聚磁场”，通过知识溢出、资源共享与成本节约，放大集聚调控的乘数效应。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着因集群组织繁育程度不高而导致的区域集聚调控能力偏弱问题，这是造成南北经济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的突破重点。

平台经济的网络控制：资源配置的数字中枢。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平台经济凭借网络效应与数据优势，成为重塑资源配置格局的关键力量。其通过连接供需两端、聚合流量与数据，形成规模越大—匹配效率越高—资源吸附力越强的正循环机制，同时依托算法规则、数据资产，实现对产业链的动态调控。一个地区平台企业越多、平台经济越好，其大范围整合资源能力就越强。平台思维及平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当前南北经济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诱因，更是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的优先方向。

枢纽节点的流量控制：要素流动的物理中枢。交通枢纽、物流节点与大型批发市场是区域经济的“流量入口”，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通过竞价机制降低各类成本，激发企业集聚动力。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依托发达物流与交通体系，日均处理超百万件包裹，吸引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形成强大要素集聚效应。海量要素涌入推动市场建立透明竞价机制，使原材料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物流效率提升近50%，为中小微企业协同创新提供环境，助力义乌成为全球小商品贸易核心增长极，印证了流量控制对经济集聚的推动作用。

生态环境的引力控制：要素集聚的软磁极。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生态与宜居条件构成区域经济的软磁极。资本和企业遵循“用脚投票”的市场逻辑，倾向资源配置效率高、制度成本低的区域，这使生态环境的引力控制成为六大控制体系中最持久、最经济、最集成的发展驱动力。生态环境引力控制则以制度成本优势和其他五大控制载体共同形成了要素引力场—这种需求引导—技术突破—空间协同—网络整合—流量加速—环境滋养的传导链条，或许勾勒出各控制载体通过要素流耦合形成的螺旋上升机制，为解析增长极形成机理提供了分析框架。

锚定极化需求导向，把准山东建设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的重点方向

从国发〔2022〕18号文明确山东为北方地区“战略支点”，到总书记要求“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山东在全国区域发展大局中战略定位的进一步提升，这既是莫大信任，更是崇高责任。这就要求我们立足理论前沿，避免传统路径依赖带来的实践误区，靶向聚焦、精准施策，努力探索出一条破局革新、高效务实的增长极建设之路。

核心目标：避免“二维发展”误区，强化功能壮大。传统区域经济规划常陷入“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的二元思维，或单纯追求经济体量扩张，或片面强调质量效益提升，却忽视增长极核心功能塑造。若仅关注规模，易导致要素无序堆积、产业同质化；若仅偏重效益，则可能因功能单一、集聚不足而削弱极化效应。推进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在核心目标选择上应紧紧围绕集聚调控功能壮大这个核心，充分认识区域增长极建设与一般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全面审视、系统梳理终端集聚控制、稀缺技术控制、集群组织控制、平台网络控制、枢纽流量控制、环境引力控制等载体建设存在的优势和差距，打好锻长板、补短板的主动仗，依靠核心功能壮大为增长极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推进方式：避免“平面铺排”误区，强化拱卫集成。通过强化战略支点推进增长极建设，是区域经济谋划的常规做法。而战略支点又可根据其控制载体不同，划分为上述六大类型战略支点，从而形成各具功能、层级分明、协同互补的网络化支撑体系。传统区域经济推进常陷入平面化铺排误区，或盲目追求全域均衡发展而分散资源，或忽视战略支点的功能差异，致使同质化发展、散点式堆砌。推进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在推进方式上：一方面以深化济南、青岛都市圈协同联动发展为核心战略枢纽，省内其余市根据六大控制载体的比较优势，科学确定省级战略支点，梯次培育市级战略支点，构建双核带动、多点支撑、上下共促的增长极支撑体系；另一方面对照国际一流标杆，全力推进省市两级战略支点培育发展，着力解决集聚功能不够强、能级提升不够快、支点作用不够好的突出问题，促进战略支点强起来、多起来。

实施路径：避免“单点突进”误区，强化系统耦合。增长极建设绝非单一要素或环节的孤立突破，而是六大控制载体协同发力、系统集成的过程。传统建设路径常因过度聚焦某类控制载体，导致要素间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削弱增长极的整体效能。推进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建设，需立足系统思维，应大幅提高产成品比重，优化三次产业产品结构，强化终端集聚控制；激发企业科创活力与优化大学学科设置并举，完善高新技术成果集聚筛选转化落地机制，强化稀缺技术控制；加强链长制实质性嫁接，推动成熟产业集群向块状经济产业生态跃升，强化集群组织控制；珍惜平台资源，大力实施国家级成熟平台提质扩容工程和垂直细分平台精准培育工程，强化平台网络控制；推动航运及大型批发市场由单纯货物集疏运中心向生产加工、商贸服务、产业创新等复合功能转变，强化枢纽流量控制；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完善政策的温暖度、适配度、持久度，强化环境引力控制。

保障机制：避免“短期趋利”误区，强化长效赋能。增长极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若陷入追求短期政绩、忽视持续发展误区，将严重损伤增长极的长远竞争力。山东需构建长效保障机制，在制度层面，建立省级增长极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控制载体建设重大问题，制定动态监测与考核评价体系，将集聚调控能力提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在要素层面，设立百亿级增长极建设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关键技术研发、平台网络升级等领域；在风险防控层面，建立产业预警机制，针对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技术替代、市场挤出等风险，加快转旧增新力度，增强抗风险能力；在区域协同层面，深度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产业互补、技术共享、市场互通，拓展增长极的辐射范围。

建设北方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既是系统能级的跃升，更是思想观念的革新。只要我们全力深化改革创新，精准把握建设方向，山东一定能够在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的征程中稳健前行。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提升核心城市首位度，借鉴实行实体化运作

都市圈同城化『蛋糕』如何做大

□ 崔露雨　鞠卫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不久前召开的济南青岛都市圈联动发展协同开放会议也指出，要在推进圈内同城化上持续发力，深入实施“强省会”“强龙头”战略，注重实绩实效，确保每年都有新进展新变化。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要健全推进机制，强化规划引领，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区域带动力和创新引领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第一，共建现代产业共同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增强都市圈核心竞争力，首要的是夯实都市圈的经济基础，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实现产业一体、协同发展。重点是“四化”：一是集群化推进，认真总结青烟威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集群做法，引导都市圈内城市聚焦优势领域，实行错位发展，促进链主企业和中小企业形成紧密的产业合作关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支持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等产业建强高能级创新载体，搭建协同发展平台，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探索设立产业基金，共建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二是联盟化发展，成立都市圈技术转移联盟，建立“研发+生产”“策源+转化”产业协同机制，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探索组建旅游发展、数字经济、人才服务等联盟，联合开展旅游推介、人才招引等活动，实现跨区域、跨行业合作。三是一体化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共建产业园区、离岸创新中心，探索建立税收分享和经济统计分成机制，形成一批“产业飞地”“人才飞地”“科创飞地”。四是前瞻化布局，放大量子科技、深海开发、空天信息等发展优势，培育氢能、核电等新优势，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抢占发展新赛道。

第二，搭建互联互通通勤圈。基础设施是都市圈内外衔接的纽带，必须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流动。实现“三个结合”：一是客货结合，结合“十五五”规划研究，编制都市圈交通专项规划，优化布局圈内城市间轨道交通，加强城际交通联系；在重视高铁的同时，应高度重视货运铁路特别是重载铁路的规划建设，加强铁路扩能改造，深化山东港口与黄河腹地的交通联系；加快建设周边城市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的快速通道。二是河海结合，大力发展通道经济，谋划推动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科学规划京杭大运河与小清河联通工程，实现通江达海；提升沿海港口能级，加快发展航运保险、海事仲裁等港航服务业，向贸易港、金融港转型升级。三是软硬结合，既要抓好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政务数据互联互通，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打造数字都市圈。

第三，提升核心城市首位度。都市圈发展关键看核心城市的带动、辐射能力。山东是全国少有的两个都市圈获批的省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核心城市首位度不够、带动能力不强。一方面，要做大做强济南、青岛两个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大力培育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上合示范区等平台，加快中新未来产业城建设，导入一批高端产业、创新资源，形成新的发展增长极。济南、青岛的比较优势是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服务圈内城市的重点所在。应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会议会展、现代物流、科技服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业态，推动要素资源在圈内加速流动，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另一方面，要推动双城、两圈联动发展、特色发展。健全省级统筹机制，在产业布局、要素集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科学规划设计，实现产业错位、功能互补、标准衔接。聚焦打造济青发展轴带，建立多层次、常态化合作机制，在黄河流域开放门户、齐鲁科创大走廊等方面形成一批合作事项、共建项目，联合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持高能级开放合作平台联动创新。

第四，打造能源革命新范式。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山东的重大使命。都市圈建设更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能源结构调整上大胆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重点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跨区域供热。这方面，两个都市圈都有很好的案例。聊热入济、泰热入济拉开了济南都市圈供热一体化的序幕，聊热入济项目建成后可为济南新增约1亿平方米的供热面积。应完善政策措施，支持有余热资源的企业开展长距离供热，加强跨市统筹利用，打造北方地区能源合作典范。海阳是全国第一座主城区实现核能供暖全覆盖的城市。未来还有一批核电项目建成运营，应抓紧谋划胶东核电供暖一体化，覆盖青岛都市圈内更多城市，替代传统的煤电机组，大幅降低煤炭消费总量。二是大力发展氢能。我省氢能产业处于快速成长期，济南、青岛、淄博等市共同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应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氢能产业布局，实施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在氢气制取、储存、运输等方面加大技术迭代创新力度，培育燃料电池、绿氢生产、装备制造、综合能源站等比较优势，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氢能发展高地。三是用好地热资源。有序推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积极探索地热清洁供暖、制冷商业化模式，拓宽在种植、养殖、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第五，实行实体化运作。建议学习借鉴南京、成都等地做法，健全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协调推进机制，设立实体化运行的都市圈推进办公室，抽调力量集中办公，协调推进重大事项、重大项目。清单化推进合作，每年制订行动计划，在交通、产业、科技、民生等领域推出一批合作事项，加快实现“一小时通勤圈”、同城化发展。发挥济南、青岛主体作用，主动与周边城市衔接，在科创资源、产业协同、交通布局等方面共建共享，把都市圈这个“蛋糕”做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健全常态化调度落实机制，省级层面定期召开推进会议，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市级层面建立都市圈各市对口部门交流合作机制，共建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17个“国家级”都市圈都有哪些特点与经验借鉴

济青都市圈的全国方位与“破圈”之道

□ 李少星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践。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全省抓改革创新促高质量发展大会把“深化济青都市圈协同联动改革”列为10项重点改革任务之一。为什么要重视都市圈的培育建设？济青都市圈在全国都市圈建设中处于什么方位？山东该如何进一步推进济青都市圈发展？

为何要大力发展都市圈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看，产业和生产要素向都市圈集聚的趋势明显，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有利于因势利导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提高国家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当前，我国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区间，然而受人口总量增长放缓、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等因素影响，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和产业将更加显著地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完备、发展确定性更强的区域集中。都市圈依托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产业发展生态更为健全，就业多样性和灵活性更强，创新资源更为丰富，无疑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承载空间。

从应对国内外各种压力和挑战的现实需求看，都市圈的增长极地位突出、但也存在不少短板，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内部增长潜能、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国内外都市圈均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风险加剧、内需不振等问题相互交织的整体形势下，推动都市圈现代化发展，不仅有助于发挥综合竞争优势、培育更多新兴增长点，也有利于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形成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国都市圈建设还存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有待加强、内部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特征还比较明显、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还不够高等各类问题，这又为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承载空间。

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要求看，都市圈空间范围大小适中，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有利于推进各类政策的统筹衔接、形成更具示范推广价值的体制机制创新经验。国内批复的都市圈规划面积多数在2万平方公里左右，与动辄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相比，建设范围更为聚焦，可以更好确保相关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的针对性与操作性；而与单一中心城市相比，都市圈建设又能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充分探索跨区域、跨层级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强化城市协同发展的集群效应。尤其是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活跃，对制度和政策创新的需求更加强烈，深化跨区域的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显然有助于更好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更多改革动力。

各地都市圈建设实践有何特点

自2021年苏皖两省联合印发《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至今年3月河北省出台《石家庄都市圈发展规划》，国内已先后启动17个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的都市圈建设。山东是除广东外第二个拥有“双都市圈”的省份。

面向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要求，各相关地区均把都市圈建设置于战略优先位置，从基础设施一体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统一开放市场建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角度，积极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比如，南京都市圈按照共同建设、共同招商、共同运营、共享发展思路，组建滁州南浦合作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南谯浦口产业合作园区”；长株潭都市圈布局6条融城干道，深入实施半小时交通圈建设；成都都市圈共同推进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打造都市圈“生态绿心”；深圳都市圈通过强化深港协同与飞地经济发展，构建“研发+制造+配套”的一体化协作链条等。实践证明，都市圈以其广阔的投资潜力、旺盛的消费需求、完备的支撑功能，正加速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区。

当然，受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各都市圈除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角色不同外，其整体推进模式也存在一定差异。

总体而言，17个都市圈中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较高，与周边区域的协同联动程度更深，中心城市外溢效应更加明显，这使得它们的建设路径表现为圈内、圈外统筹推进的一体化特征，需要化解的矛盾更多集中在如何推动都市圈产业发展和科创功能高端化、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营管理等领域。而郑州、西安、武汉、成都等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规模效应明显、首位度较高，其建设任务更加侧重于中心城市功能的有序疏解、化解突出的虹吸效应等方面。而济南、青岛、福州、石家庄、合肥等都市圈中心城市集聚力和带动力还相对不高，其对如何提升中心城市发展能级的诉求更加迫切。相比而言，长株潭、厦漳泉都市圈内主要城市则各具特色，需要更多考虑如何在相对均衡条件下，充分发挥各城市的差异化条件、形成优势互补效应等。

此外，所处区域的不同也使它们形成明显的动力机制差异。比如，对于济南、青岛、沈阳、西安、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地区都市圈而言，受整体发展水平和北方地区的制度与文化特色等因素影响，它们更易于形成政府主导的推进格局。而对武汉、成都、重庆、合肥、长株潭等内陆都市圈来说，由于它们在港口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以对外开放为牵引、强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外部动力相对不足，未来需要在进一步加快内陆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发挥其在中部、西部等经济区域中的枢纽地位，提升城镇化、消费升级等重大战略对都市圈一体化的贡献作用。

如何推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随着济南、青岛都市圈相继获批，全省区域发展格局迈入历史新阶段，持续加大推进力度、创新推进路径与体制机制成为当前山东省推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是要突出市场主导。济青都市圈相对广深、成渝等都市圈协同联动进程而言，空间距离相对较远、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外溢效应还不够强。但越是如此，越要注重遵循市场规律并按照市场化方式，通过组建市场化运营管理平台、选择确定性更强的先导领域、设计精准的引导政策等方式，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防止出现政策空转和投资浪费。在此方面，可参照江浙沪同比例出资、同股同权成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发展建设公司的经验做法，设立都市圈协同发展基金或市场化运营平台，支持跨区域重点合作项目建设。

二是要突出内外协同。在深入推进都市圈内部同城化发展、两圈之间协同联动体制机制建设的同时，要加强两圈与潍坊、淄博等济青沿线城镇的深度协调，引导产业链共用环节向淄潍两市集聚，加快供应链物流管理等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济青发展轴带产业布局一体化。要依托山东自贸区济青片区、上合示范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协同创新，加快进出口“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便利化改革，提升两大都市圈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枢纽功能。

三是要突出制度创新。圈内及毗邻市要按照一个行政区的概念和思维，在企业经营资质认定、产品质量监管、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能力水平评定等领域，探索建立政务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推动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认定标准等要素相统一，逐步实现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行政审批结果互认。要持续深化跨地区交通、旅游、商贸等市场消费的共同开发，积极推动生产要素交易、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等服务平台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集团化运行，充分释放全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四是要突出示范引领。比如，围绕产业联动发展，以产业链关联配套、重大生产力协同布局等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飞地经济、“一区多园”等示范性合作项目，鼓励物流仓储设施、大科学装置、实验平台、中试生产线等共建共用，完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化合作机制。对此，要针对性建立以实际质效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各市县合作项目实施进度、可持续性、综合带动能力等的科学引导，增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者系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院教授）